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屈原及其诗歌研究

常 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屈原及其诗歌研究

常 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及其诗歌研究/常森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0416-0

I. ①屈… II. ①常… III. ①屈原(约前 340 ~ 约前 278)—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IV. ①K825.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9178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书 名: 屈原及其诗歌研究

著作责任者: 常 森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416-0/I · 245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mm × 1230mm A5 11.5 印张 310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

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的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目 录

引言:屈原作品总说及本书撰著宗旨	(1)
第一章 超越和承继:屈原诗歌与原始传统	(11)
第一节 楚文化及楚辞中的原始神话传统	(12)
第二节 由追问更认清虚无	(25)
第三节 由看透而识拔形式	(102)
第四节 屈原所扬弃之原始神话不限于楚	(119)
第二章 屈原诗歌的艺术符号	(143)
第一节 《离骚》“占卜”模式	(144)
第二节 屈作“男女关系”模式	(152)
一、“求女”	(152)
二、对“媒理”的焦虑绝望以及“媒理”的缺席 ...	(176)
三、“求女”与“求男”的混杂和同义转换	(181)
第三节 《离骚》“香草”模式	(220)
余 论	(236)
第三章 “寄情寓言”以及屈原的“形式主义”	(238)
第一节 中国寓言研究:在想象和历史之间	(241)
一、中国“寓言”之名实	(242)
二、中国寓言传统的断裂	(255)
第二节 屈子的“寄情寓言”	(271)
一、屈子寓言的特质	(272)
二、屈子寓言的误读及其解读方法	(282)
三、屈子寓言之能指的独立性	(290)

2 屈原及其诗歌研究

第三节 屈子诗歌中的比	(301)
一、何谓比	(301)
二、《离骚》之比	(309)
三、《招魂》及《九歌》之比	(322)
余 论	(335)
结 语	(343)
主要参考文献	(346)
后 记	(353)

插图目录

- 图 1 (明)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 图 2 楚帛书 (14)
- 图 3 子弹库帛书神像举例 (14)
- 图 4 龙凤人物帛画 (15)
- 图 5 人物御龙帛画 (16)
- 图 6 女岐九子 (33)
- 图 7 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图版 270 (45)
- 图 8 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图版 172 (46)
- 图 9 九凤 (53)
- 图 10 陆吾,即开明兽 (57)
- 图 11 土螭 (57)
- 图 12 相柳 (62)
- 图 13 三面人 (63)
- 图 14 巴蛇 (65)
- 图 15 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图版 158、176 (70)
- 图 16 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图版 148、149 (71)
- 图 17 冰夷,即河伯 (74)
- 图 18 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图版 172、173 (80)
- 图 19 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图版 258、265 (84)
- 图 20 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图版 168 (86)
- 图 21 夔 (100)
- 图 22 《钦定补绘离骚图》 (104)
- 图 23 鸾鸟 (127)

图 24	英招	(132)
图 25	双双	(134)
图 26	帝之二女	(136)
图 27	鼓刀	(163)
图 28	礼魂	(188)
图 29	林纾等译《伊索寓言》内文页示例	(263)
图 30	“集”字甲骨文字形	(301)

引言：屈原作品总说及本书撰著宗旨

屈原的不幸成了后人的大幸。除了《橘颂》，其全部传世之作，都是他品味着自己人生悲剧和国家政治悲剧创作的，没有这两大悲剧，便不会有《离骚》、《天问》等一系列伟大诗篇了。郭沫若曾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对于他真是特别厚待，他既禀赋有充分的诗人气质，而使他处到了国将破、家将亡的境遇，玉成了他成为一个空前而且恐怕绝后的伟大诗人。”^①《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从现代学术立场上看，称为诗更妥当，不应称为赋），实际传世者笔者以为仅 22 篇，而实际散佚者当亦不止三篇。这 22 篇包括以下几部分：

一是《离骚》，殆成于顷襄三年（前 296），其现实触媒是怀王客死于秦。该诗表现形式奇诡而繁复，基本内容则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作者的人生追求，二是作者人生追求跟世俗社会尤其是楚国上层的尖锐矛盾，三是作者对人生追求的悲剧性的执著。其间既申明了正确的治国道路，又揭破了现实政治之弊，对子兰集团误国、害君作了严厉的声讨。结果因子兰集团反扑，诗人被顷襄流放到了江南。《离骚》充分展示了屈子的人格、艺术特色及成就。漫漫数千年中国历史，若论一首诗能让其作者永垂不朽，《离骚》是无与伦比的。

二是《天问》，作于顷襄三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之后，具体说是这次流放的陵阳时期。孙作云评价道：“作为史料来用，《天问》也十分有价值。因为它问了 172 个问题，就今本所残存的篇章而

^① 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73 页。

论,共有 374 句,从天地开辟一直问到春秋末年,其中包括天地产生以前,天地开辟以后,以及人类的起源、尧舜的故事、洪水的传说,下至夏代、商代、西周、春秋的历史大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从宇宙的起源、人类的产生问起,下及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时代、封建制初期的种种传说和史事,可谓洋洋大观。”^①其实该诗最能代表屈原睿智深刻的思想。漫漫数千年中国历史,若论诗歌的思想深度,《天问》亦是无与伦比的。

三是《招魂》,作于被顷襄流放的陵阳时期。在屈原作品中,这首表达主体人生抉择的诗构思奇幻,结构也最为严整。

四是《九章》组诗,共九篇。其中《橘颂》是现存屈原最早的诗篇,作于怀王时担任左徒期间;《惜诵》、《抽思》、《思美人》、《惜往日》作于被怀王放逐汉北时期;《哀郢》、《悲回风》作于被顷襄流放陵阳时期(前者作于被放逐九年时,殆在顷襄十一年);《怀沙》、《涉江》作于被顷襄流放沅湘时期。《九章》以发愤抒情、袒露胸臆见长,往往与两次被放贴近,不平之气尤浓。

五是《九歌》组诗十篇(《礼魂》为《国殇》收束部分,参见后论),作于被顷襄流放的沅湘时期,是屈子现存最晚的作品。这组表达幻灭情思的诗标志着屈子艺术创造的巅峰,也标志着中国诗歌象征艺术的巅峰,其中多数作品情思含蓄、悠长而柔美,《国殇》则不乏雄毅刚健之气。

屈原诗歌确实是他生命的结晶。他在被疏远、被放流、被迁徙直到自沉汨罗这一现实悲剧不断展开和深化的过程中,创作了《橘颂》以外的一系列杰作。这些诗抒写或激荡或平和的深情,充满对信念与追求的不屈或幻灭,洋溢着对社会恶浊势力绝不调和的斗争精神以及对国家无比深挚的爱,总体上体现了一位不顾个人安危利害,执著追求国家富强有道、人民明理向善的诗人—政治家曲折悲壮的一生,几乎篇篇都是不可多遇的千古大文。

^① 孙作云:《〈楚辞〉与上古史研究》,参见《孙作云文集》所收《〈楚辞〉研究》上册,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45—146 页。

就体式论,这些作品丰富多样,显示了非凡的创造性。明汪瑗《楚辞蒙引》“乱”字条云:“洪氏曰:‘《离骚》有乱有重。’是矣。瑗按:有乱者,《离骚》也,《九章·涉江》也,《哀郢》也,《抽思》也,《怀沙》也,凡五篇。有重者,后《远游》一篇而已。然又有歌词,有倡词,《抽思》篇是也。又有问答之词,《离骚》篇、《惜诵》篇、《卜居》篇、《渔父》篇是也。以文体论之,《离骚》、《远游》二篇相类也,《九歌》十一篇相类也,《九章·橘颂》自当别论,余八篇相类也,《卜居》、《渔父》二篇相类也,《天问》一篇自为一体,其句法又模拟乎《三百篇》而少变者也。此其大略也。”虽然汪瑗误将《远游》、《卜居》、《渔父》视为屈子所作,又不知《招魂》亦屈子作品、《九歌》实只十篇,但其论列屈子诗歌体式之异同,有足资参考者。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楚辞类叙云:“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习见“楚辞”一称亦作“楚词”,既指以屈原诗歌为核心的一系列作品,又指这些作品所表征的一种诗歌体式。那么何以谓之“楚辞”呢?人们常引宋黄伯思《校定楚词序》之语,曰:“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其实此说大有偏颇。从语言、文字层面来说,屈作跟中原的差异性绝对不及其同一性,这是极显白的事实。南国楚辞与中原诸作之歧义主要在声。《隋书·音乐志》谓“唐山夫人能楚声,又造房中之乐”者,即此类。惜乎后世能为楚声者不多,使之渐趋湮灭。明儒陆时雍云:“《诗》之江汉,收载《周南》,而楚无闻焉。自屈原感愤陈情,而沅湘之音创为特体,其人楚,其情楚,而其音复楚,谓之‘楚辞’,雅称也。”(《楚辞疏·楚辞条例》)此说较少为人注意,但简明扼要,更得其实,不过,后人承袭、仿效之作当不限于此例。

从艺术创造方面来说,屈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终结

了这个时代(后代因袭仿效者虽多,却无人能企及他所缔造的高度)。那是属于屈原自己的时代,跟之前属于《诗三百》的时代双峰并峙;由此,一颗耀眼的巨星和众多闪烁的小星星汇成了先秦诗歌迷人的夜空。在那一时代,屈原的诗歌是如此孤独的吟咏,只间或传来数声寥落的回响。不过虽是一个人的歌唱,却如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声闻于天。他如此辉煌地开幕,又如此辉煌地谢幕。他以诗为生命,亦以生命为诗。他的自杀并非普通的自杀——他在诗歌中不停地咏唱着死,对他来说,死也只是诗歌变幻了一种书写的方式。

屈原堪称无与伦比的高峰。苏轼作《归朝欢》词,说:“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其实屈原死后,空的不只是楚山,整个神州大地上再没有产生《离骚》那样的洪钟巨响。陆时雍云:“浑沦如天,旁薄如海,凝重如山,流注如川,变化如鬼神,驰骤如风雨,奇丽如品物,文章至此可谓尽神。自古能文,屈子亦其中之一矣,余则支流余派已矣!”(《楚辞疏·读楚辞语》)古人或并论《离骚》、《庄子》、《史记》,曰:“余尝谓古书无所因袭,独由创造者有三:《庄子》、《离骚》、《史记》也。”(焦竑《楚辞集解序》)又或并论《诗》、《春秋》及《骚》,云:“《诗》亡矣,《春秋》不作矣,《骚》亦不可再矣。”(汪瑗《楚辞集解》自序)凡此均非虚言。

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说:“我国最古之文学作品,《三百篇》外,即数《楚辞》。《三百篇》为中原遗声,《楚辞》则南方新兴民族所创之新体。《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三百篇》为极质实的现实文学;《楚辞》则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此其大较也。其技术之应用亦不同道。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则亦一进步也。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①梁启超还说:“中国文学家的老祖

①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第81页。

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①的确，“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至关重要。古人固尝感慨：“夫骚存而不善读之，犹之无骚也……”（陆时雍《楚辞疏》所录周拱辰《楚辞叙》）

屈原的影响贯穿了此后所有的时代。晋人王恭（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辛弃疾《生查子》（“独游西岩”）词写自己常到山中溪边读《离骚》的一段经历，道是：“山头明月来，本在高高处。夜夜入青溪，听读《离骚》去。”明代有一位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好观《楚词》，“时时以《楚词》袖之登小舟，急棹滩中流，朗读一叶，辄投一叶于水，投已辄哭，哭已又读，读终卷乃已”（凌迪知《氏族博考》卷四《雪庵和尚》）。屈原必将与民族一起永存。

然而，对读者、研究者来说，屈原及其诗歌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近代以来尤其如此。屈原、屈作使现代人的解读能力显得匮乏——古人固多错谬，但总体而言，他们不像现代人这样盲目无措或者自负、狂妄。近现代有一批研究屈原屈作的大家和名家，重要成果也不鲜见，但在整个楚辞研究领域，像他们那样迎接挑战并取得成功的学者寥若晨星，故整体上看，研究屈原和屈作几乎完全成了一项具有探秘性质的事业，自矜独得其秘、实则强为解人者不少，甚至有不少重要学者认定屈作不可解，是内容和艺术草率拙劣的“歪诗”。

20 世纪初，谢无量曾批评道：

自来楚词被那些北学派的迂腐先生注坏，单把屈原看成个忠臣义士，所以句句都说是喻君，篇篇都说是讽谏，好像屈

① 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 49 页。

原因为上一两条陈给楚君,他不肯用,竟投水自尽了。像这样说,屈原岂不是呆子。恐怕错看或小看了屈原罢!屈原是一个未得大用的政治家,是一个很有野心的爱国者。他的思想言论,在这几篇残缺杂乱的楚词以外,必定还有许多,不过我们看不见了。^①

这一批评有些道理,屈原确非谏君不被听从便去自杀的腐儒。可令人惊奇的是,谢无量其实也“错看或小看了屈原”,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他把以屈作为主体的楚辞视为“残缺杂乱”之作。他批评的“那些北学派的迂腐先生”可能确实迂腐,但不会如此轻狂地面对屈子。谢无量认为楚辞“可解不可解”,《离骚》不过是一首“歪诗”。他说:“拿了一部可解不可解的《楚词》,看来好似平淡无奇,说他从前有多大的影响,好叫人不能相信。”^②又说:“自从屈原做了《离骚》这种歪诗,偏就有宋玉一般弟子从他学习。后来又有那些人模仿《楚词》的体格,来替屈原追悼。”^③初看谢无量斥骂“北学派的迂腐先生”,还以为他发现了真谛,原来他只是发现屈诗几乎不可知、几乎是草率拙劣的混说。

屈原以后,人类又经历了千百年进化,但其解读诗歌的能力却似发生了严重的退步。屈诗卓犖超拔,让谢无量无法知其就里。既然如此,又下此等断语,则只能是信口雌黄、大言欺世了。不过也不能一味指责谢无量他们,屈作实在太难索解了,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评判。

屈作最难解读的是《天问》、《九歌》、《离骚》后半和《招魂》,细分之,从艺术方面看,《九歌》、《离骚》后半及《招魂》最难解读,从文本涉及的神话传说和史实看,《天问》之难则无出其右。《天问》使近代以来最有成就的诗歌研究家为之苦恼。比如,陆侃如说:

① 谢无量:《楚词新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60—61页。

② 同上书,第62页。

③ 同上书,第63页。

原还有一篇奇奇怪怪的作品，叫做《天问》。这篇有两大缺点：（一）文义晦涩。……（二）文理错乱。这篇并无结构，只是混说罢了。……从这两个缺点上……我以为这一定是他极烦恼的时候随便诌起来的，而且也必非一时所诌的，否则作品决不至这么拙劣。……这样杂乱的晦涩的问题合在一起，实在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实在不能叫做“诗”。^①

“奇奇怪怪”，“晦涩”，“错乱”，“混说”，“随便诌”，“拙劣”，“实在不能叫做‘诗’”，这是后来以《中国诗史》名世的学者陆侃如对《天问》的评价，让人诧异。

诗人学者林庚先生说：“《天问》……这一部杰作一直成为诗坛的怪谜。”^②他本人未被这怪谜吓到，而且还揭破了一些重要谜底，但很明显他承认《天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屈作如同怪谜的不只是《天问》，《九歌》、《离骚》、《招魂》等几乎篇篇如此。于是乎用解谜的方法进行诠释，似乎成了近今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在茫然无措中的唯一选择。这里聊举一二例。

《离骚》写主人公上叩帝阍遇阻，求宓妃、简狄、二姚等美女均告失败，之后请灵氛占卜，要巫咸降神等等，而自“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以下，是说他决计“远逝以自疏”、“聊浮游而求女”，最终因故国情深，未能真正远去。这些文字宏肆幽深，古今学者备极叹赏，但往往苦于其幽微意旨难以捉摸。面对这一段远逝自疏，当代学者魏炯若猜想：“屈原在王甚任之的时代，曾经有过奇谋秘计，只怀王一人知道。由于事关军国机密，不能披露，因此借写行程来寄托这件事？”^③他倾向于将它解释为屈原设计的一

① 陆侃如：《屈原》，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87—94页。

②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民族诗人屈原传》，见《林庚楚辞研究两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③ 参见魏炯若《楚辞发微》，与《杜庵说诗》合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6年，第89—90页。

个打击秦国的宏伟军事计划。^①实际上,这一军事路线图纯粹是想象,从现有文献和屈作中得不到任何支持。博闻强识如屈原者,亦不会出此劳师袭远,“须经许多国家”、“出师万里”以“拊秦之背”的计策——只要读一读《左氏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前628)所载蹇叔谏阻秦穆公之袭郑,就可知此计之荒谬。

如此猜想《离骚》后半的旨意,只不过是诸多怪事中的一件。此外,魏炯若似乎又独知屈原经营南楚以抗秦的“秘而不传”之事,并依此对《九歌·湘君》、《湘夫人》的爱情悲剧作了十分独特的解释:“窃疑当屈子经营南楚时或为一蛮族公子所爱,如《少司命》之所书者,而屈子亦思因以成事。以王及楚贵族不能识屈子深意,出而干涉,严令悔婚。屈子以为如以王命悔婚,则蛮必疾楚,疾楚,则原经营南方之初计,不惟无益,反成害矣。若引其罪于己身,自己在南楚之影响即便破灭,而楚蛮关系不致破裂。两害相权,取其轻者,故采避不与公子相见之策,而成此二湘之悲剧。作者使二湘之神不得相见者,其故即在是欤?”^②屈原是中国最具想

① 古代已有类似说法。如王夫之《楚辞通释》解《思美人》“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迁逶次而勿驱兮,聊假日以须时。指嵎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数语,云:“操,持轡也。迁,改也。逶次,逶巡顺路而缓行也。嵎冢,在秦西,秦始封之地。纁黄,日斜色赤黄时。怀王听张仪之邪说,为秦所诱执,如纵轡驰驱以致倾覆,原愿顷襄惩前败而改辙,已将授以固本保邦待时而动之策,如操轡徐行,审端正术,则可以自强而待强秦之敝。秦者,楚不共戴天之仇而不两立之国也。深谋定虑以西捣其穴,至于嵎冢,虽未可卒图,而黄昏不为迟暮。此与岳鹏举痛饮黄龙之志同,而君儒臣奸,忠臣被祸,其不能雪耻以图存一也。”此类说法虽古已有之,而越到后来解释得越细,也越牵强。

② 魏炯若:《楚辞发微》,与《杜庵说诗》合刊,第110页。按:其释《大司命》、《少司命》、《山鬼》等诗,亦颇喜谈屈原经营南楚之事(分别参见该书第112—113、113—114、117—119页)。其释《国殇》,又以为其中死事者“非楚国之正式军队,而为屈原所募集之义军”,“屈子之赋《国殇》,叹楚国之士尽也。而亦以叹楚且自叹。叹楚者,此人就歼,则秦兵深入更无后忧。自叹者,多年心血,尽于一旦,而屈生存之意亦尽矣。屈之沉湘,何故在此时?又何故在南楚?盖无人能言其故。既分析《九歌》内容,然后知屈子经营南楚,盖死而后已。其沉湘,疑即在赋《国殇》、《礼魂》之后不远,盖痛其无复救楚之术而发愤自沉也。书阙有间,自《九歌》外,更无可以为证者矣”(参见该书第120—121页)。